

杨慎小集编刊、评点与“读杨网络”的形成*

张 蒂

内容摘要:杨慎在嘉靖三年(1524)谪戍云南后,文学活动主要在西南地区进行,其生前自觉通过编刊、评点小集并向江南等文学中心传播的方式,构建跨地域的诗学名望。他反对大全集之书籍形式,偏爱小集,并且倚重吴地的编刊技术,希望刻集于吴。就杨慎本人小集的刊刻而言,《南中》诸集间或采用时兴的“苏式本”版刻风格;同时,作为最高产的评点本作者之一,他所评选的时人诗文几乎全为吴人小集。杨慎声名通过这两种有地域导向的渠道播扬到江南,推动以南京部、寺各级官员为中心的杨慎集读者网络在嘉靖末、隆庆初形成。

关键词:杨慎 《南中》诸集 实物版本 阅读史 跨地方性

小集为别集之一体,最早可以上溯到梁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①。一官一集或一地一集,本质上都是以作者人生某一时段为限来结集。南宋以降,小集的另一个近源是陈起刊刻的“书棚本”唐人小集与江湖诗人小集。这种小集是刻书业的产物,通过精选,提高传播效率。近世小集受这两种渊源的影响,具有即时性的文献特点,其文本内容与书籍形式是追溯文学思想和诗文传播“原生态”的重要资源。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小集的即时传播特性,并且对小集提供异文、佚篇等方面的文献价值有所发掘,对于小集的实物版本虽然也有基本考述^②,但有关书籍形式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籍版本学史”(22&ZD331)阶段性成果。

①李延寿:《南史》卷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页。

②李瑄:《文人小集在明清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价值——以袁宏道〈敝篋集〉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70—77页。罗鹭:《书棚本唐人小集综考》,《国学研究》第三十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1—(转下页)

具体意义的讨论还不够充分。

杨慎是明嘉靖间最多产的小集作者与选家。他于嘉靖三年(1524)谪戍云南,直到三十八年(1559)去世,后半生足不出西南。其声名的崛起,势必要依赖多媒介、跨地方的作品传播。彼时的江南既是文化中心,又是书业的前沿所在,加之吴中士大夫与杨慎所持文章博学的“文学”观念适相契合^①,江南遂成为他追随时尚、万里投名的首选。

杨慎诗名在江南的确立主要得益于三种媒介:一是本人的小集,二是他所评选的吴人小集,三是杨慎晚年肖像。本文对前人考鉴尚有疏失的杨慎《南中》诸集重加审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部分小集的“趋吴”特质;继而揭出杨慎评选时人小集的原作者绝大多数是吴人的特殊现象;最后以人日草堂雅集为切口,论述南京郎官朱曰藩等人围绕杨慎肖像所举行的诗学授受仪式,以及杨慎去世后十年间(1559—1569)集结于南京部、寺的“读杨网络”。

一、杨慎的小集编刊态度

杨慎小集并不一定都是自己选定的,他参与的程度有深有浅,因此在讨论具体情况之前,有必要明确他对小集的总体看法,以及对刊刻人、地的态度。万历十年(1582),八十一卷本《太史升庵文集》刊行,其中后四十一卷诗文“采释百家、杂注博物语”^②,强化了杨慎文章博学的整体形象。晚明王世贞、胡应麟等人接续而起,都有卷数超过《太史升庵文集》的全集。然而,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杨慎本人明确反对全集这种书籍形

(接上页)336页。[日]内山精也撰,张洵译:《南宋后期的诗人、编者及书肆——江湖小集编刊的意义》,《新宋学》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6—185页。程海伦:《宋代小集传播的文学效应——以南宋中后期诗坛为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94—100页。叶晔:《〈盛明百家诗〉与明别集的早期佚本及形态》,《传统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第28—47页。邢云龙:《宦游与小集:日藏明刊孤本袁中道〈新安集〉考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26—342页。

①关于明中叶吴中文章博学的思潮,详参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142页;陈广宏:《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34—148页。

②杨慎著,杨有仁编辑:《太史升庵文集》卷首《重刻杨太史升庵文集例》,天一阁博物院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庄诚刻本(索书号:善3811-1),叶一。

式,推崇小集。

笔者新发现一篇杨慎集外文《与张禹山论诗书》,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晰的陈述:

两得近日高制,篇什极富……此二首可传……即前所刻篇什,已埒盛唐诸集之数,此等则留之家藏可也。大抵古人之文贵选、贵精……惟宋人以多为务,集有至百卷者五六十家,然今日传者几邪?王浚川亦近代佳手,近睹其集将百卷……亦务多之病也。若薛西原自选其诗二百余首,则绝无是弊,走以为今之绝识焉。^①

杨慎得到挚友张含“近日高制,篇什极富”,但认为其中仅二首可传,所以劝他满足于此前已刻的小集。杨慎褒扬薛蕙,指责王廷相,前者的《薛西原集》二卷(嘉靖十四年[1535]李宗枢刻本)显然是小集,后者《王氏家藏集》若干种(嘉靖刻本)已是丛书形态。由此可以了解杨慎以盛唐别集的篇数为准则,对宋人全集颇有微词,所考量的主要因素是历时的传播效力。其实,就共时维度而言,小集也是优于全集的。

杨慎不仅注重小集这种别集特殊形式,对小集刊刻的地域与主事者也有所品择。因为僻处西南,他特别留意在江南刻集。嘉靖三十二年,杨氏的妹夫刘大昌说:“公之诸诗,滇云、贵竹及吴下、浙中多有拓本、传刻,虽详略不同,先后互见,而咸可讽味,并叶风雅。”^②这里的“拓本、传刻”应该包含石刻、板刻两类印本。加上刘大昌等人正在四川进行的编刊活动,云、贵、川作为杨诗传播中心是在意料之中的,此外便首推“吴下”“浙中”。刘大昌此语颇有矜夸杨诗远播文化中心之意,但其中多少也透露出杨慎本人的意图。

更直接的记载是,昆山人周复俊在杨慎过世时回忆道:“俊往时总宪蜀台,邂逅公金沙寺,谓予不鄙斯集,幸刻诸吴中。”^③他多次到云南、四川履职,与杨是故交,“自嘉靖乙未至甲寅,俊三入南滇、载仕西蜀,凡二十

①杨慎:《杨子卮言闰集》下卷,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莆中方沆校刊本(索书号:308.07394),叶四十二至四十三。

②杨慎撰,冯都成、韩述甫辑:《南中集钞》卷首《升庵南中集续钞题辞》,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索书号:平图014522),叶一。按,文中索书号有“平图”字样者皆为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几经辗转后暂贮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③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泾林文集》卷五《杨升庵集叙》,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年(1592)周玄暉刻本(索书号:09293),叶十九。

余年,恒与公握手接膝,散帙论文”,酬赠往来“无虑数十百札”^①,所以他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彼时杨慎与周复俊会晤于成都,他却托这位父母官把自己的诗集带回吴中刊行,足见其心中的规划。

杨慎刻集于吴的夙愿,要从他对江南刻书业的态度说起。《古文参同契序》记:“未几有人自吴中来,则有刻本。”^②这是苏州云岩道人在正德末编次,至嘉靖十二年王围山人刊行的本子^③。《跋新刻水经》曰:“吴中新刻酈道元《水经》,规制装演[潢]甚精,但误字苦多耳。误而相似,鲁鱼帝虎犹可改也,所恨为浅陋妄庸者,以意匠擅加笔削。”^④所指应是嘉靖十三年黄省曾刻本。此外,杨慎写给朱曰藩的信中称“新刻《庾开府集》甚佳”^⑤,而朱氏刻本《庾开府诗集》书尾有牌记“吴下马相、陆宗华写刻”^⑥。虽然杨慎经常对吴中刻本的校勘质量表示不满,但相较而言,他所关注的最新印本书籍几乎都是吴地所出,对同期其他刻书中心如南京、杭州、福建等地则未加垂注。

杨慎在世时,周复俊确实受邀参与过杨慎小集的编刊。嘉靖三十二年,周复俊再次来到云南,在《刻南中集钞叙》中称杨慎来信云:“以《南中集钞》梓绣未精,丁宁雕易。”^⑦现存刊刻于该年的《南中集钞》,除了有周氏此叙,还有一篇刘大昌的《升庵南中集续钞题辞》称:“江阳东沙冯子、旻庵韩子校录其遗逸为《续钞》,走因以《马嵬》《秦陵》二首坌入卷隙,付之梓工……集凡四卷,诗近百首,填词二首附见焉。”^⑧此本卷端即有“门人江阳冯都成、韩述甫校录”的题名。所以,王文才折衷周、刘二氏的序文,解释这个刻本为:“云南按察周复俊筹资倡成,而为慎门人冯都成、表

①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泾林文集》卷五《七十行戍稿序》,叶十五至十六。

②杨慎:《太史升庵文集》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年(1582)蔡汝贤刻本(索书号:02903),叶四。

③潘雨廷:《道教史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5页。

④杨慎:《太史升庵文集》卷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年蔡汝贤刻本,叶三。

⑤杨慎:《升庵诗文补遗》卷一《与朱射陂书二则》,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4册,天地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⑥庾信:《庾开府诗集》卷六,国家图书馆藏明朱曰藩刻本(索书号:11146),叶十一。

⑦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泾林文集》卷五,叶四。

⑧杨慎撰,冯都成、韩述甫辑:《南中集钞》卷首,叶一。

弟韩述甫校录,自是刻于泸州。”^①恐怕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刘、冯、韩三人与周复俊应该分属两班人马。今《南中集钞》凡五卷,附录一卷:卷一至四俱收诗,惟卷四末附词《百字令》《酹江月》二调;卷五分上、下,又俱收诗;附录为《读景川曹侯开河碑》诗并跋。刘大昌称“集凡四卷,诗近百首,填词二首附见焉”,与今本前四卷的面貌正好对应。而第五卷应是周复俊续编的。周复俊《刻南中集钞叙》有两个版本,一是本书所载,一是周氏文集所载,后者末尾多出“刻成,视前上卷,通为二卷云”一句;另一篇《升庵玉堂集序》也说:“《南中集钞》二卷既楔诸木。”^②因此“视前上卷”的意思,应该是周氏原计划将刘大昌原编前四卷并作上卷,自己新编的作为下卷,总为二卷。但今本分卷还是保留了刘大昌原来分定的四卷,至于周复俊新编的部分若通作一卷,则叶数畸多,所以分成了卷五上与卷五下。

另外,今本《南中集钞》的书籍形制也提供了线索:前四卷的卷端作“杨升庵南中集钞卷某”,版心作“南中集钞卷某”,各卷比较统一;卷五上的卷端是“南中集钞卷五上”,卷五下的卷端是“杨升庵南中集卷五下”,版心上镌“南中”,中镌“卷五上”“卷五下”,与前四卷是不同的。然而,所有卷端书名都是“南中集钞”,无一采用刘大昌题辞中所谓“南中集续钞”,可以推测今本前四卷应该已经是周复俊重刻的了。

这样看来,杨慎向周复俊抱怨的“《南中集钞》梓绣未精”,有可能就是指刘大昌所编四卷本《南中集续钞》。但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指更早的三卷本《南中集钞》。此本是嘉靖二十年遂宁知县杨泰抄录,交由县丞李守维刊刻的^③,写刻工似乎也不比上述《南中集钞》精熟。无论如何,相比泸州或遂宁,杨慎都更仰仗吴中的技术。更不用说周复俊的参与,能让自己的小集在吴中密切的交游网络中流通,向江南扩大影响。

杨慎去世后,门人丘文举向再次在云南任职的周复俊出示了杨氏最后一部自订小集《升庵七十行戍稿》,附录生平所著书目,周氏立即在云

^①王文才:《杨慎学谱》,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1页。按,其实王文才已经指出杨慎《木泾周公哀集鄙诗刻之作此以谢》及李元阳《与升庵太史书》所谓“宪长周公处得寄新刻”均指此集。周复俊显然不止是出资者。

^②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泾林文集》卷五,叶五至六。

^③杨慎:《南中集钞》卷首《叙南中集钞》,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年(1541)刻本(索书号:平图014521),叶一。

南将其付梓。嘉靖四十三年,周复俊在致仕归乡的第三年,终于完成杨慎的夙愿,在昆山刊刻了他的诗文合集十四卷^①。

杨慎不止一次向吴人吐露对西南本地版刻技术的不满,比如他向姜龙抱怨过《赤牋清裁》的云南刻工。姜龙曾被杨慎目为“吴人,博学”^②,嘉靖元年至四年任云南按察使司副使。此后杨慎一直与他保持联络,有至少三通尺牋存世,其一云:

侍生杨慎顿首

时川老先生大人执事:不获奉问又一年矣。留落南荒,日有衰颓而已。去岁贱眷自蜀来居安宁,求田为终焉之计。又以走无子,新纳一妾,已有子兆,枯杨老蚌,亦强颜矣。执事情至,故不敢以隐耳。南江同年过京,便草草附起居。外新刻古赤牋一本,采掇颇亦精严,但梓人苦拙,只存犴羊,有暇命工一翻刻之,庶借重以传,亦文苑之一事也。更得高明赐数语,尤幸尤幸。冀秋凉复得左右手迹尔。修楮悵悵,如何可言。

二月十七日慎生再拜。^③

据王文才《杨慎学谱》,杨慎纳妾事在嘉靖十三年,次年六月生子^④。今谓“已有子兆”,则此信作于嘉靖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遂知所谓“新刻古赤牋一本”是指嘉靖十三年刻《赤牋清裁》^⑤,卷首张绎《赤牋清裁序》称:“初获会城本于姻戚邢无敏所,锐图广之,则闻字颇为刻遗讹,遂托无敏考证,洎重誊于笺,无剗乃速善工梓成。”^⑥此前刻于昆明的“会城本”已嫌遗

①按,王文才等人在整理《杨升庵丛书》时发现了该种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升庵文集》,“首冠嘉靖甲子南京太仆寺卿周复俊序……类编诸文为卷十四……然所收文,溢出万历文集者,至五十余首之多,尤可珍也”(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3册《升庵遗集·后记》,第1111—1112页),未说明藏地。笔者调查,书名、卷数能与之对应者,惟蓝田县图书馆藏《杨升庵文集》(索书号:470/000529),但该馆著录为清末刻本,惜未目验。

②杨慎撰,丰家骅校证:《丹铅总录校证》卷四,中华书局,2019年,第143页。

③《史可法、左光斗、杨慎、熊廷弼等明贤忠烈尺牋集册》,西泠印社2014年秋季拍卖会,第1075号拍品。

④王文才:《杨慎学谱》,第59—60页。

⑤关于《赤牋清裁》版本,详参汤志波:《〈赤牋清裁〉〈尺牋清裁〉版本考》,《中国古典文学》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69—297页。

⑥杨慎辑:《赤牋清裁》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索书号:SB/818.1/4694),叶一至二。

讹,但杨慎对张绎所聘“善工”仍感“苦拙”。

姜龙入滇前,因谏武宗南巡,谪为建宁府同知,在闽参与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武夷志》等书的刊刻。嘉靖二十二年,姜龙为杨慎《滇载记》作序云:“吴陆子浚明往在谏垣,以直言废,家居。余间出其稿,陆子乃亟为披校,缮写入梓,冀衍其传,俾异日职史者有取焉。”^①经姜龙介绍,《滇载记》得以由长洲人陆粲刊行。次年,此书又被上海人陆楫收入《古今说海》(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9403),刻于云间。

可以说,杨慎找姜龙讨论刻工优劣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姜龙与周复俊都是熟悉编次、刊印之事的吴人。前引杨慎《木泾周公哀集鄙诗刻之作此以谢》的诗题也透露出端倪,“哀集”和“刻”对应的正是编刊技术的两方面。

二、《升庵南中集》两种与《升庵南中续集》的版刻风格

接下来通过具体版本,对比分析杨慎小集的吴中风格。现存杨慎小集多是孤本,很难判断原刻或翻刻,还有一些书名同为《南中集》、卷次却不同的本子。《玉堂》《南中》诸集之外,又有数种同名《杨升庵诗》的本子,既有单收玉堂或南中诗的,也有杂编的^②。总之,杨慎小集的版本系统较难厘清,笔者另有专论,此处不赘。

“南中”是杨慎后半生的主题,也是他诗学成熟的阶段。《升庵南中集》现存嘉靖本两种,一是国家图书馆藏七卷本(索书号:15727),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六卷本。七卷本有嘉靖十六年王廷所作刻书序(以下简称“王廷本”),但卷七却多为杨慎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间往返川滇时所作^③,与前六卷的写作时间刚好以嘉靖十六年为界;而且前六卷与卷七版刻风格不同,后者字体与卷首的张含、朱光霁二序相近。所以笔者认为王廷本的前六卷应当刻于嘉靖十六年,而第七卷及卷首二序则是续刻。

①《滇载记》卷首,杨慎撰并辑:《杨升庵杂著十四种》,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杨宗吾刻本(索书号:17689),叶五。

②如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杨升庵诗》五卷(索书号:A01659)全为玉堂诗,而另一明刻本《杨升庵诗》五卷(索书号:15730)则是玉堂、南中诗的合编。

③如卷七《戊戌除夕赠荣经徐尹》为嘉靖十七年作,时杨慎奉戎檄归蜀途中;《闰七夕》应作于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另外王文才将《别刘善充》诗系于嘉靖二十一年修《四川总志》后准备返回云南时(《杨慎学谱》,第199页)。

进一步而言,王廷刻前六卷于亳州,第七卷可能是他携书板至苏州府而续刻的。王廷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任苏州知府^①,期间刊刻了文征明诗集并作序^②。次年入计,王廷“以素笺百幅为贄”,获得时署吏部验封司郎中、吴人钱邦彦的清议^③。可见他颇通吴中风雅,故很可能执《升庵南中集》的印本乃至书板入吴,以备羔雁之需。

另一种六卷本《升庵南中集》是嘉靖二十四年谭桢刻本(以下简称“谭桢本”),副使孔天胤《刻升庵南中集叙》反复赞叹此本“其刻之如古金石刻”^④。谭氏时任浙江按察使司佥事,还刊刻过杨慎的《五言律祖》,得到杨慎认可,曾寄示朱曰藩:“《律祖》谭少梅[崐]近刻颇佳,今以诸帙奉寄。”^⑤谭桢本的刻工出自孔天胤于杭州组建的《资治通鉴》刻书局,均为擅长“苏式本”^⑥刊刻的专业能手。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时任浙江提学副使的孔天胤在杭州主持刊刻《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资治通鉴》及《资治通鉴考异》等典籍。刻《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时,他从苏州聘写工五人、刻工五十余人。《资治通鉴》及《资治通鉴考异》开雕,继续以这批人手为主力,辅以少数徽、浙工匠。江晓称道孔天胤刻《资治通鉴》曰:“以校订则慎简学博暨髦士,以书镂则鸠诸吴,俾精类宋籍。”^⑦嘉靖二十四年,孔天胤还刊刻了《越绝书》,属比较成熟的苏式本,其刻工姚江人夏恕亦参与过《资治通鉴》局^⑧。谭桢本(图1左)与此《越绝书》(图1中)字体相似,行格相同,板框高广、版心样式也基本一致。

①钱谷辑:《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十,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索书号:11754),叶六。

②文征明撰,文嘉述:《甫田集》卷首《文太史诗叙》,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线善808944-49),叶一至二。

③冯时可撰,任弘道选:《冯元成选集》卷六十《大司寇景山钱先生行状》,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索书号:T340917-52),叶八。

④杨慎:《升庵南中集》卷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涪州谭桢刻本(索书号:平图014519-014520),叶一至二。

⑤杨慎:《升庵诗文补遗》卷一《与朱射陂书二则》,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4册,第80页。

⑥“苏式本”是李开升所概括嘉靖刻本三种风格类型之一(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第72页)。

⑦江晓:《集录文章正宗序》,真德秀:《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卷首,浙江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孔天胤刻本(索书号:善003650),叶三。

⑧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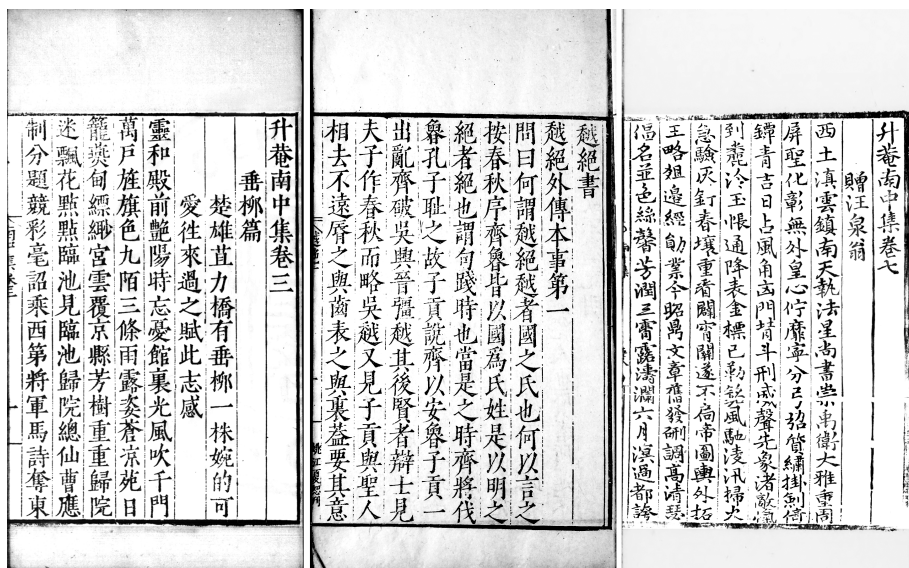


图1 譚榮本(左)、《越絕書》(中)、王廷本(右)字体比较

譚榮本展现出吴中刻书的审美倾向,虽然未必出自杨慎的主动要求^①,但实际收效则是从杭州向两浙、三吴传播。吴中刻工的直接参与或指导,使得此本《升庵南中集》趋向吴中士人的“宋本”品味。相比起来,王廷本(图1右)的前六卷受“京式本”^②影响明显,笔画流利,连笔较多,接近自然书写。亳州在南直隶西北边缘,相对远离“苏式本”的影响。

《升庵南中集》之后,最有机会吸引江南艺苑的,当属嘉靖二十九年刻本《升庵南中续集》四卷。全书为行书字体,号称是摹刻杨慎书迹上板。此书之四周双边者为原刻,四周单边者为翻刻,卷首都有张含《升庵南中续集序》,但内容完全不同:双边本款署“嘉靖庚戌中秋日永昌张含序”^③,单边本款署“嘉靖庚戌上春廿八日癸巳禹山张含识”^④;双边本张含序篇幅更长,言之有物;单边本序文较简略且大半在交代籍贯、名、字、

①按,杨慎与孔天胤的交游不详,仅《海内绝句十首》有“好音文谷遥怀孔”一首,篇末注:“孔名天胤,刘名绘,皆未面神交者。”(杨慎:《太史升庵遗集》卷十七,杭州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汤日昭刻本,索书号:普103/2371,叶七十八)

②关于“京式本”,详参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39页。不过此本前六卷的书体近欧,与典型“京式本”的赵体略有差异。

③杨慎:《升庵南中续集》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15728),叶二。

④杨慎:《升庵南中续集》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线善17534-36),叶一。

科第等基本信息,不似挚友口吻。

上海图书馆藏单边本是与谭荣本《升庵南中集》合装的,前后纸张、印工相近,所以笔者推测两套书板曾经庋藏于同地,很有可能是浙江按察使司。果如此,单边本伪张含序有一处耐人寻味的地方,称:“此升庵杨太史所著《南中续集》也。亦升庵手书,所畀工人梓迹也。”反观双边本序文从未提及刻书事,遑论“手书”云云。伪序所谓“升庵手书”似乎是翻刻者打出的幌子;“亦”字暗示此前还有另一部手书上板的小集。虽然如此,原刻双边本的版刻行书确实接近杨慎手笔,翻刻者只是把这一点挑明了,未必是妄言。隆庆间,杨慎的《哲匠金桴》和五卷本《杨升庵诗》^①也是行书上板。

《升庵南中续集》尽可能地通过雕版印刷,再现杨慎的书法风格,而书法本身就是杨慎与吴人交友的重要形式之一。他与文征明同官翰林院时曾一同探讨过孙过庭“五乖五合”说^②。单就此集而言,首尾二诗《寄文征仲兼问讯姜梦宾》《顾箬溪中丞载酒过滇馆》就各有“近得王家湖水帖”“逡巡醉写张颠帖”^③之句,文征明、姜龙、顾应祥三人都是苏州士人。

①即国家图书馆藏明刻五卷本《杨升庵诗》(索书号:A01659),王文才称之为“嘉靖手写五卷本”(《杨慎学谱》,第197页),余琮定为嘉靖三十二年以前所刻(《杨慎〈玉堂集〉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雷磊指导〕,2020年,第6—7页)。按,笔者重审王文才发现的朱茹《杨升庵诗序》,推断此五卷本《杨升庵诗》应是隆庆刻本。朱茹《杨升庵诗序》文中称大礼论定、世庙云云,显然作于隆庆以后,朱序所言“今手书所为诗篇若干、卷凡五”(虞怀忠等修,郭棐等纂:《〔万历〕四川总志》卷二四,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九年刻本,索书号:线善788550-53,叶六十一至六十二),完全符合此本面貌。同样手书上板的《哲匠金桴》(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15949)卷尾有隆庆五年(1571)云南按察司副使朱茹《跋哲匠金桴》,应是同时同地所刻。

②杨慎:《墨池琐录》卷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十九年(1540)成都许勉仁刻本(索书号:平图020062),叶六。

③杨慎:《升庵南中续集》,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卷一,叶一;卷四,叶八。按,三位吴人在篇卷结构中的位置并非随意安排,唐宋以降的诗集编次讲求用怀友念旧之作“压卷”“压阵”体例(详参李成晴:《唐宋文集的“压卷”体例及其文本功能》,《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171—183页);再者,杨慎此集保留手书诗稿原貌,用小字在诗题下或诗尾附注人名姓字,固有刻意标榜交游的意味。

另一方面,万历以前书籍全文采用行书字体的案例比较罕见^①。但明中叶“写刻本”却集中现身于三吴,被认为是苏州刻书业内部对“苏式本”方体字的反动^②。这种写刻本拒绝模式化,着意再现笔意,书手身份意识明确。这虽然与摹刻作者本人书迹的《升庵南中续集》不尽相同,但单就审美取向而言,却是类似的。

三、杨慎对吴人小集的评选

地域导向性不仅体现于杨慎本人小集的编刊,也体现在对时人小集的批评上。杨慎所批云南本地士人张含小集的数量最多,因为二人过从密迹;评选李梦阳、严嵩诗,除了表达诗学立场,也被认为具有社交性功能^③。但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通观杨慎评选时人小集,除上述三家外,其余作者几乎都是吴人,他的诗学声名也因此 in 江南得到了更集中而有效的传播,他的文学批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觉建构名望的跨地方谈艺。

从嘉靖二十八年到去世,杨慎该时期评选的顾应祥《簪溪归田诗选》、顾起纶《玄言斋集》《昆明集》、朱曰藩《池上编》、陈凤《清华堂稿摘存》都有原刻存世;评周复俊诗最早,但初本失传,只有部分评语存录于万历本《周太仆六梅馆集》。此外,还有一种浙江德清人蔡汝楠的《白石山人诗选》也是杨慎评选吴人小集活动的延伸。嘉靖三十二年,蔡汝楠在四川按察副使任上获见杨批顾应祥集,遂在去任后给杨慎寄去自己的诗稿^④,今天一阁博物院藏有残本《白石山人诗选后编》(索书号:冯善2303)。

这些评选本是诗会、尺牍等综合形式谈艺的产物。周复俊初次入

①赖伟宏:《明代版刻行草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刘元堂指导),2021年,第7—8页。

②李开升:《宋体字初现:明代中叶影响全国的苏州式刻本》,陈正宏主编:《苏州刻书史》,凤凰出版社,2023年,第156页。

③王懿容:《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新论杨慎》,台湾“中央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康来新指导),2014年,第66页。

④蔡汝楠:《自知堂集》卷十九《奉顾簪翁先生二首》,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胡定刻四十三年(1564)朱炳如印本(索书号:善4/396),叶三。

滇,与杨慎有“仙村草堂之会”^①,这应该是杨氏评选其诗的缘起:“各出所制,以相订正,弥七昼夜,论辩欢洽,若以石投水,深用叹服,称为文园宗匠。”^②此会上,二人还对唐、宋、元诗加以扬榷,详见周复俊《评点唐音序》:“余往年出使南滇,邂逅升庵太史杨公,散帙仙村,弥七昼夜。”^③

杨慎与朱曰藩、顾起纶也是千里笔谈。《朱射陂诗选序》对应的论诗书是《寄升庵书》和《与朱射陂书》,该序内容与二书互见。杨序顾氏《昆明集》有言:“滇、吴分域于中,奋飞无翼,安得与子并游昆明,一咏兹集也?因感子之兴,力疾为书,以酬千里之好云。”^④顾氏曾官云南中卫经历、摄昆明县事^⑤,在《国雅品》中追忆了杨慎谈艺的神采^⑥。

陈凤宦蜀时已是杨慎晚年。杨慎寓泸养病,二人面交并不多,《清华堂稿摘存》卷末所附《升庵先生诗启》收录了二人探讨诗学的尺牍、诗札。信中除了品评诗歌而外,还提及“朱射陂新刻十册”“宋人《寓简》”^⑦云云,这些书帕往来也是谈艺一端。

杨慎将诗集之选看作高级的诗学知识和技艺:“作诗之难,难矣,未若选诗之难也。”^⑧他将唐人别集体例作为选诗的准则,并基于可传性,让主观的价值判断相对客观化:“诗盛于唐而王、孟、高、岑大家之集各不过数卷,而进士刘沧、马戴又不盈百首,人至今诵之。”^⑨董其昌曾称赏杨慎

①周复俊:《风雅逸篇序》,杨慎编:《风雅逸篇》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索书号:善800115-16),叶一。

②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泾林文集》卷末周玄暉跋,叶一。

③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泾林文集》卷四,叶四十至四十一。

④杨慎:《书昆明集》,顾起纶撰,杨慎选:《昆明集》卷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昆明五华书院刻本(索书号:平图015977),叶一。

⑤张芾:《杨慎滇蜀往返行迹补正》,《国学》第六集,巴蜀书社,2018年,第247—261页。

⑥顾起纶辑:《国雅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年(1573)顾氏奇字斋刻本(索书号:09222),叶二十。

⑦陈凤撰,冯惟訥编,杨慎批点:《清华堂稿摘存》附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平图015169-015170),叶一至二。

⑧杨慎:《太史升庵遗集》卷二四《皇明风雅选略引》,叶六十三。

⑨杨慎:《箬溪归田诗选序》,顾应祥撰,杨慎评选:《箬溪归田诗选》卷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云南知府陈光华刻本(索书号:平图014450),叶二。

作为选家的眼光：“盖有可传之道，杨氏窥之深矣。”^①杨慎的评选本在晚明成了一种范式。清初有人请钱谦益編集，要求“精择其尤者以垂于后，杨用修之于张念先〔愈光〕、朱子价，例可引也”^②。此即指杨慎批张含、朱曰藩小集。

选的关键在于辨体，以此品评高下。有时代之体，如杨慎初识周复俊便称其诗：“真乃缘情、绮靡之端脉，永平、正始之遗音也。”^③所以杨氏评语主要推轂其六朝风格，谓之“有江文通之韵”^④。又如评朱曰藩：“盖取材《文选》《乐府》，而宪章于六朝、初唐。”^⑤有家数之体，如评顾应祥：“《苦热行》长古之篇……上窥杜陵《桃竹杖引》，下犹顾刘叉、张碧，必传之作也。若《做贼好》《检尸篇》《莫祈雨》……与王建《簇蚕辞》、元稹《田家词》异世同旨。”^⑥有时则综合运用时代、家数等不同术语，如评顾起纶：“余尝评其《玄言集》在孟襄阳、韦苏州之间，及览兹集，则益征其尽出开元标格、大历情性，信名家也。”^⑦

杨慎选本对江南的影响也表现在顾起纶《泽秀集》备受杭州书业的青睐方面。此本是顾氏小集的合编，卷端题洪楸编次，王问、李文麟、杨慎、皇甫汈评选，这四家本来分别是各小集的评选者，卷首田汝成序称题名为杨慎所定。洪楸《泽秀集总编》收辑了诸集旧序，题识曰：“顾儒林诗，高流品之者众矣。然而杨太史序中所称警句诸篇，并不见兹集。何欤？盖儒林鉴识颇精，自律更严，合诸家之选而手抄之，所取故不寥寥菁秀哉。”^⑧在各家旧序中唯独关心杨慎的批评。考虑到洪楸在清平山堂的业绩，可说杨慎之评选至此已经进入书坊的视野。这或许是一种预兆。天启间，《杨升庵先生评注先秦五子全书》及《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等

①董其昌：《周太仆六梅馆集叙》，周复俊：《周太仆六梅馆集》卷首，叶一。

②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01页。

③杨慎：《杨子卮言闰集》下卷《答周工部木泾书》，叶二十四。

④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泾林诗集》卷一《山中谣桃源道中作》，叶十。

⑤杨慎：《朱射陂诗选序》，朱曰藩撰，杨慎批选：《池上编》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三十五年（1566）三癸亭重刻本（索书号：12222），叶一。

⑥杨慎：《箬溪归田诗选序》，顾应祥撰，杨慎评选：《箬溪归田诗选》卷首，叶一。

⑦杨慎：《书昆明集》，顾起纶撰，杨慎选：《昆明集》卷首，叶一。

⑧洪楸：《泽秀集总编》，顾起纶：《泽秀集》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吴郡朱氏竹素斋刻本（索书号：402.6 12485），叶十九。

题名杨慎批评的汇刻子书也出现于武林书坊。

总之,杨慎评选吴人小集与其本人小集的编刊,背后有相对一致的观念,所以能够呈现出某种成体系的理论意识。这是杨慎关乎诗之话语及书籍制作堪称“诗学”,并受江南读者认可的重要原因。

四、嘉靖后期“读杨网络”的结成

围绕小集评选的跨地方谈艺,影响不止是诗学。朱曰藩、蔡汝楠二人请杨慎评诗的尺牍,开头都先叙自己读杨慎各类著述之事^①。《丹铅》诸录是杨慎最有名的读书笔记,但隆庆以前的引述者屈指可数,主要集中在江南,尤其是南京部、寺各级官员,其中就有顾应祥与周复俊。换言之,在杨慎评选吴人小集的同时,南京郎署逐渐形成了一个“读杨网络”。以下对其成因略作分析。

杨慎不仅有意识地围绕小集进行面向江南的文学活动,还在中年以后开始有意识地制作不同类型的肖像^②,并通过形象传播让自己成为三吴艺苑的“在场者”。据临摹过杨慎像的清人钱杜说:“先生像滇中有三本,一在永昌铁树岭,作道士装;一在大理写韵楼,作处士装;一在昆明陆尔玉家,作冠服像,盖晚年弟子所摹。”^③临终卧榻的杨慎在感慨“老使形衰”^④之际,将肖像远寄金陵,南京太医院籍的陈凤充当信使。嘉靖三十八年,朱曰藩主持了一场人日草堂雅集,颇有诗学授受仪式的意味:悬杨慎像于斋壁,汇聚焦山中泠泉、阳羨贡茶、宣德白瓿、南海沉水香等晚明茶事谱录中推为上品之物,与金子舆、何良俊、文伯仁、黄姬水、郭第、盛时泰、顾应祥(字孝符,顾璘之孙,非前文所述者)八人以茶供之,瞻仰作礼,依照“侍侧之礼”就座,分韵赋诗,并由文伯仁绘图^⑤。杨慎在这一年的七月去世,但其生前收到了诗画^⑥,想来他应该满意这样的安排。

①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三二《寄升庵书》,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1573)刻本(索书号:线善841161-72),叶十三。蔡汝楠:《自知堂集》卷二十《致杨升庵》,叶五。

②王文才:《杨慎学谱》,第341页。

③钱杜:《松壑画赘》卷上《杨升庵先生像》,上海图书馆藏清刻《榆园丛刻》本(索书号:线普长379972-87),叶十六。

④陈凤撰,冯惟讷编,杨慎批点:《清华堂稿摘存》附录《升庵先生诗启》,叶二。

⑤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三一《人日草堂引》,叶三。

⑥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四《郭次甫诗序》,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二年(1584)刻本(索书号:GJ/113761),叶一。

过去研究多受《列朝诗集》影响,强调此事之为“先辈风流”或“艺苑之美谈”^①,不经意间解构了其中器物与仪式的严肃性。清人邹炳泰观文氏《人日草堂图》曾有“瓣香大地属吴贤,驰仰何分人万里”^②之句,点明杨慎传诗法于朱曰藩。朱氏时任南礼部主客司郎中,南方供品与南海番国贡物正是其职掌所在,如阳羨等地“每年送至荐新茶芽”就明确载于典制^③,沉水香大抵也是朱氏容易接触到的一种贡物。他平日交接的宾客礼制活动,大约也影响了文人雅集。同时期在结社讲学的心学群体间盛行的王阳明像及其相关仪式,也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当是时,阳明先生之像遍天下”,就在朱曰藩诸人雅集的前几年,同在南曹为官的何迁持阳明像过访茅坤,后者自称:“往往以不及从之游,睹其所为冠裳容貌为恨,今乃得依先生之像类甚者,存而礼谒之。”^④

不仅是图像载体,就在人日草堂雅集的前一年,南京的这个社群也接收到了口传的杨慎“近照”。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

尝问大周云:“老先生与杨升庵同乡,亦常相见否。”大周曰:“升庵在家时余尚幼,故家中未曾相见。后升庵谪戍,住札泸州,是云南、四川交界之地,乃水次埠头也,四川士夫进京皆至此处下船。在泸州尝一见之。升庵下笔则亹亹不竭,然不善谈,对人言甚謇涩。其服饰、举动,似苏州一贵公子。”^⑤

大周即四川内江人赵贞吉,嘉靖三十四年前后在南京部、寺迁转,三十六年升任光禄寺卿^⑥。据何、赵文集,二人有且仅有一次倡和往来,发生在

①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丁集卷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4545页。

②邹炳泰:《午风堂集》卷六《文五峰人日草堂图》,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四年(1799)刻本(索书号:线普长011738),叶十八。

③李东阳等修:《大明会典》卷一〇五,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四年(1509)司礼监刻本(索书号:A00403),叶四。

④茅坤:《赠画像者蔡少壑序》,茅坤著,张梦新、张大芝点校:《茅坤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0—411页。

⑤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第159页。

⑥张克伟:《明儒赵贞吉之行履实录及著作》,《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5—21页。

嘉靖三十七年春何良俊辞官卜居金陵时^①。同一年成书的王世贞《艺苑卮言》称：“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作。”^②杨慎晚年寓泸的形象集中流传于三吴之地或许不是巧合，“苏州一贵公子”的形容已经揭示出他本人的形象追求。

嘉靖间，杨慎在艺苑的声望有所偏重，大抵先是举业，次是诗学，最终才是博学。晚明最有名的杨慎读者李贽感叹道：“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尤可笑矣！”^③蔡汝楠《致杨升庵》曰：“仆自束发即知诵先生之书，以为举业，诵辛未魁卷状元策。以学古文诗词，诵《题评檀弓》《诗集》《诗话》《乐府》《逸诗》《韵经》。以开闻见，诵《滇记》《余录》《续录》《谈苑》。”^④陆粲也曾自述：“粲自羁贯时诵公文章，已深向往。及壮登仕，与令弟用德为同年，又同入馆，每从询公动定之详，以不获侍教为恨。其后自谏省谪都匀，间于一二士友家睹公手书滇中诸作，良用叹服。归田以来，始得《转注古音略》，读之为不忍去手。”^⑤李贽、蔡汝楠、陆粲三人，李氏时代最晚，“博学”已成为杨慎形象最主要的底色，而蔡、陆二氏与杨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在学习举业阶段听闻杨慎之名，随后陆续获读杨慎著述，表明从其科举时文到诗古文辞、再到笔记杂著被时人接受，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第。

对江南士人而言，杨慎诗古文辞的影响，早且胜于笔记之类的杂著^⑥，这个过程中围绕小集编刊、评点展开的谈艺活动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所以随着杨慎有意识地向江南传播诗名，其笔记杂著的读者群体也率先在南曹结成。

①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五《答赠赵大周先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华亭何氏香严精舍刻本（索书号：平图 015916-015921），叶十三。

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陕西省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苏州刻本（索书号：善 0000873），叶十四。

③李贽：《焚书 续焚书》卷五《读史·杨升庵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207—208页。

④蔡汝楠：《自知堂集》卷二十《致杨升庵》，叶五。

⑤陆粲：《陆子余集》卷六《与杨用修太史书》，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陆延枝刻本（索书号：09134），叶八。

⑥早在嘉靖十六年就已十七卷本《丹铅余录》在云南刻成，此后名目繁多的诸录陆续行世，但是《丹铅》诸录的盛行，在万历以后才比较显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除《丹铅总录》外，诸录多半刻于地处边陲的云南官府。

杨慎笔记的读者在嘉靖后期逐渐出现。以征引《丹铅》诸录为例,万历以前主要有陈士元《归云别集》《归云外集》、郎瑛《七修类稿》、顾起经《类笺唐王右丞诗集》、顾应祥《人代纪要》《静虚斋惜阴录》、周复俊《泾林杂纪》、王世贞《艺苑卮言》、陈耀文《正杨》、李蓁《黄谷琐谈》、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等。

这一统计或有遗逸,但以上读者多数聚于南曹的共性是明显的:嘉靖二十九年,顾应祥升任刑部尚书,旋调南任;周复俊在嘉靖四十年官至南京太仆寺卿;陈耀文、李蓁则是中下级郎官。而上文提到的朱曰藩长期在南刑、兵、礼三曹迁转,与一众南京郎官结社,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也是人日草堂雅集中人;朱、何继顾璘之后一同主持青溪社^①。此外,王世贞在嘉靖末居丧在家,与南京方面联络不断,赠诗陈耀文便是明证,更不用说他此前在北京“陆沉署中”时,正是得到了刚升任的本部尚书顾应祥的推毂^②。顾起经在嘉靖三十五年刻成《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引用了《丹铅余录》三处、《丹铅续录》一处,其弟起纶也在该书校阅者之列。杭州名士郎瑛虽然没有功名,但市隐于都会,顾璘知遇其人^③,朱曰藩知见其书^④。

惟湖广应城人陈士元与这个以南曹为中心的交游网络的关系不大。不过,嘉靖十六年中举后,他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二十三年登第^⑤。当时长沙发现了“禹碑”(即所谓《岫嵎碑》),杨慎的释文传入南京,南吏部

①详参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76—86页;张燕波:《论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33—141页;陈艳:《明代金陵诗学演变与文化品格的确立——以青溪社为中心》,《中国诗歌研究》第十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31—148页。

②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十五《明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箬溪顾公行状》,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二年(1584)张佳胤刻本(索书号:T339820-24),叶五。

③许应元:《陋堂摘稿》卷十三《草桥先生传》,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索书号:线善780841-42),叶六。

④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二八《七修类稿后序代作》,叶十五至十六。

⑤胡鸣盛:《陈士元先生年谱》,《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1929年)第五号,第608—610页。

尚书湛若水立石于新泉书院^①,影响颇大。此事就发生在陈士元南监读书的同一年,作为楚人,他对这一新闻应不陌生^②。

另一方面,十卷本《杨升庵诗》的刊刻者汪尚宁在嘉靖三十三年升南京光禄寺卿。七卷本《升庵南中集》的序作者王廷在嘉靖三十九年升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此后一直在南刑、户部迁转,至四十五年升南京礼部尚书。杨慎《艺林伐山》的初刻者刘畿在嘉靖四十五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他们都对“读杨网络”的逐渐形成有鼓吹作用。

上述读者中,对杨慎著述在晚明流播影响最大的是何良俊与陈耀文。隆庆三年(156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初版十六卷以活字印行(南京图书馆藏,索书号:110671),时任南京户部郎中陈耀文的《正杨》也在同一年刊刻。何良俊仔细批读过《丹铅余录》《丹铅总录》^③,《四友斋丛说》“考文”一类,某种程度上正与杨慎“正辞”^④的文献批判方法一脉相承。陈耀文《正杨》是批判杨慎的专书,其意义不言而喻。

此后,杨慎笔记的影响力在晚明急剧增长。自他而下,一篇文章博学的著述传统垂至明末:

杨用修先生《丹铅》诸录出,而陈晦伯《正杨》继之,胡元瑞《笔丛》又继之,时人颜曰《正正杨》。当时如周方叔、谢在杭、毕湖目诸君子集中,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然其中虽极辨难,有究竟是一义者,亦有互相发明者。予已汇为一书,颜曰《翼杨》。^⑤

杨慎的形象由诗人转向博学者,未必是他依傍吴中刻书业经营诗歌小集的预期结果。不过,他确实通过本人和他人的一系列诗集在江南博得声名,又在南京一地形成了以南曹为中心的读者群体。相比之下,西南本地门生的影响力似乎相当有限,其他地域也尚未出现成规模的“读杨网络”。

① 窦文照:《窦子纪闻类编》卷一,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八年(1580)刻本(索书号:线善 824327-30),叶二十六。

② 陈士元:《江汉丛谈》卷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刻《归云外集》本(索书号:子 093-0004),叶七。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六,第 331 页。

④ 张素:《丹铅余录序》,杨慎:《丹铅余录》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新都汤传刻本(索书号:308 07174),叶一。

⑤ 周亮工:《书影》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227 页。

产生这样的结果,如果说小集编刊的“趋吴”是起因,评选吴人小集和个人形象的流传是契机,那么根源其实是杨慎与吴中文学观念的交摄,所以最终不为诗古文辞所牢笼。李攀龙云:“文学于吴,自文学子游始。”^①杨慎多次表达对子游传统的认同^②,去世后得到了“游、夏之匹”^③的定评,体现他与吴中文章博学的时风是气息相通的。

结语

相比于唐宋小集,明人小集的整理与研究整体滞后。传统校勘工作中,明人小集常被作品收录更全的全集取代。在明人小集文献校勘意义有限的情况下,本文跳出以往视角单一的版本考证的研究路径,将书籍出版还原到社会的历史语境。在杨慎的个案中,他兼有作者与选家两种身份,其小集编刊与评点是基调统一、相互作用的文学活动,皆具有跨地方交流的特性。

另一方面,本文尝试朝阅读史迈进一步,论述杨慎读者群体的形成。小集卷帙不繁,通常在作者生前成书,在传播上有较强的即时性,因而有助于考察书籍编辑、刊刻、流通、阅读在较短时期内的关系与效果。鉴于明代阅读史料相对匮乏,研究者有必要回到原点,全面掌握刊刻过程中所涉及的时、地、人,分析编刊意图与预期,重审书籍实物的版本特征、版刻风格,最后基于作者(编者)交游,探索共时的“读者网络”。在完成一系列的论证后,才有可能把历史上零散的读者和阅读行为整合起来,从而展开相对完整的阅读史研究。

【作者简介】张芾,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明代文学与书籍史。

①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九《介石书院子游祠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1页。按,吴中文学观念与本地“子游传统”的建构有关,详参李卓颖:《地方性与跨地方性——从“子游传统”之论述与实践看苏州在地文化与理学之竞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2011年)第2分,第325—398页。

②杨慎:《太史升庵遗集》卷二一《衍道文儒原鲁先生祠记》,叶三十四。杨慎:《升庵诗文补遗》卷一《与周子吁书》,王文才、万光治等编注:《杨升庵丛书》第4册,第76—78页。

③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附录《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中华书局,2008年,第1233页。